

中

中国诗话辞典

主编
蒋祖怡

副主编
王英志

陈志椿
曹旭

母庚才

北京出版社

126/2-51
2
90520

中国诗话辞典

主编
副主编

蒋祖怡
王英志

陈志椿
曹旭

母庚才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诗话辞典／蒋祖怡，陈志椿主编．-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

ISBN 7-200-02787-1

I.中… II.①蒋… ②陈… III.诗话-中国-词典 IV.
I207.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5)第13593号

中国诗话辞典

ZHONGGWO SHIHWA CIDIAN

主 编：蒋祖怡 陈志椿

副主编：王英志 曹 旭 母庚才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 京 出 版 社 总 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市房山区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8.375印张 725000字

1996年1月第1版 199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200-02787-1/Z·271

定价：36.00元

凡 例

一、本书是一部中型的资料性与学术性相结合的专科辞书。共收辞目一千二百余条。内容包括诗话理论渊源、诗话作家简介、诗话内容评析及诗话术语命题解释四个部分。

二、诗话是我国古代诗学理论的主要形式，本书将有助于读者比较系统地、全面地掌握中国古代诗学理论，并为深入学习中国文学理论史打下基础。

三、辞目释文强调科学性，力求观点正确、材料准确。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已出版的有关辞书、专著及论文，重视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吸收；但由于编者水平有限，难以充分反映目前学科研究水平，还会存在疏失和讹误。

四、诗话理论渊源：入选辞目采自先秦、两汉及魏晋间诸名家著作中，对古代诗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的有关术语及命题。设本辞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初学和自学的朋友们了解诗话术语的渊源所自，以利于正确理解和评析诗话内容。

本项辞目释文，一般以综合现有研究成果为主，凡有创造性见解，因限于篇幅，只作简要论证。

五、诗话作家简介：重点是介绍其在诗论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仕履及其他行述，力求简要，以作者生年为序。

六、诗话内容评析：除介绍诗话体例、内容全貌及版本名称外，主要评析其理论主张及其在文学理论史上的价值。

七、诗话术语命题解释：一般采用公认的观点，以体现辞书特色。凡有独创见解，也须对公认的观点有所介绍。术语命题入选辞目，一般采自诗话本身，但为助读初学者，对有关的一般诗学理论概念及诗歌风格流派常识，也酌情有所选入。

八、诗话和笔记体制相类，有些诗话本自笔记中辑出而别行者，故辞目包含有某些笔记。入选诗话、笔记均以撰述者生活年代为序；凡

不著撰人或其生平无考者，一般概列于其所属历史时期之末。

九、凡在释文上角冠以*符号者，表示该词语另有专条解释。

十、本书涉及历史纪年，一般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其括注内的公元纪年，一般省用“年”字。

十一、本书使用简化字，但如遇有歧义之嫌者，酌用繁体字。

文字表达，力求简明。为明确责任，皆于辞目正文后署名。

十二、本书后附录所收条目索引；并附录未列为本书诗话条目之“清代、近代诗话未入选书目”。

十三、为了让读者对中国古代诗话有一个全面了解并便于掌握其发展概貌，书前加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前言》。

0811/34

序

近世学人，自祖若孙皆享誉文坛者，前有俞樾（曲园）、俞陛云、俞平伯，后有蒋伯潜、蒋祖怡、蒋绍愚。伯潜、祖怡父子的国学论著，早已自大陆流布至于台湾，为各大专学府所传诵；现在绍愚先生的大著，也已开始由台湾的文史哲出版社接受出版了。

最近我到北京大学参加由东语系、东方文化研究所及东方文化研究会等联办的“东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绍愚先生（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邀我到他的家里作客。畅谈之余，绍愚先生出示祖怡先生（现任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给我的一封信，信中说他接受北京出版社的委托，主编《中国诗话辞典》，忆及八十年代中期，曾读过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拙著《中国修辞学史稿》一书，其中有许多地方涉及中国古代诗话，可见我对中国古代诗话也曾研究过，因此想请我为本辞典写篇序文；同时，附下一批辞典的资料，以供作序的参考。

蒋祖怡先生的著作早受学术界所重视，但他却不嫌弃我的卑微，一再嘱我为他所编撰的大著写序（去年曾命我为他昆仲所编写的《郁达夫旧体组诗笺注》撰写序言，该书将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正如周作人所说：“未免于他明鉴有损”（《知堂杂诗抄》自序），但也使我不敢不接受他的雅意。

中国古代诗话原是挺有价值的文学遗产，是研究诗歌创作规律、诗人事迹以及对诗歌的鉴赏和批评的笔记体著作，应该受到我们的重视。诗话中提到一字的推敲，或是得句的经过，往往带着趣味性，这本无损于诗话的价值，但却被认为是“资闲谈”之作。历代诗话至多，间有离题之作，如清代的一部诗话，其中竟有一个条目专记“移尸鳖”的事，说“鳖与毒蛇杂交，所生之鳖，谓之‘移尸鳖’，人或误食之，立死，其尸化为阵阵轻烟吹去，但余毫发散落地上”云云。如此这般与诗话无关的不经之谈，在诗话里也可以见到，致使诗话被目为下乘之作，而不能登大雅之堂。所以选其精粹，并加以整理成帙，是极有意

义的工作。

我在《中国修辞学史稿》第六篇第二十节“小结”说：“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一般以为是最早的诗话著作；其实，最早的诗话著作应该是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文学篇》，它和稍后的《颜氏家训·文章篇》，都可以说是诗话的滥觞。”蒋祖怡先生在本辞典的《前言》里，则举梁钟嵘的《诗品》为诗话的先驱，这说法也有道理。《诗品》成书虽略后于《世说》，但与上举二书同是南朝的作品，何况《诗品》全书都是诗话。蒋先生提到《诗品》的价值及其对后代诗话的影响，甚是翔实，且有创见。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宋人喜为诗话，裒集成编者至多，传于今者惟阮阅《诗话总龟》、蔡正孙《诗林广记》、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及（魏）庆之是编（按指《诗人玉屑》），卷帙为富。然《总龟》芜杂，《广记》挂漏，均不及胡、魏两家之书。仔书作于高宗时，所录北宋人语为多；庆书作于度宗时，所录南宋人语较备。二书相辅，宋人论诗之概，亦略具矣。”《玉屑》虽亦是集诗话的大成之作，但蹈袭《丛话》的地方可不少；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也有一小部分被《玉屑》所转述。后世诗话递相祖述，陈陈相因，尤其不可胜数。如明王世贞的《艺苑卮言》，虽自称“欲为一家之言”（自序），但也有蹈袭前人的地方。如论诗的八病，取自《文镜秘府论》；论点金成铁举陈无己仿杜少陵句，取自《韵语阳秋》等。清何文焕《历代诗话》甚至举旧说以为己有。如卷五十七辛集三论当句对，其说亦袭自《文镜秘府论》；又论当句对举李义山诗：“池光不定花光乱，日气初涵露气干”，其实并不是当句对。

蒋先生的《前言》曾指出：“不论是创作还是鉴赏，都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但宋人诗话，只是就辞论辞者多，兼论诗的思想内容者少。上海古籍出版社为刊印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而写的“出版说明”说：

“吴曾对于文艺的欣赏态度，有浓厚的形式主义的倾向，所作文艺评论，往往脱离了作品的精神实质来谈作品的字句，因而他的论断容易走向空虚的唯美主义的歧路上去。如下论一则：

‘白居易以诗谒顾况，况喜其《咸阳原上草》诗云：“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余以为不若刘长卿“春入烧痕青”之句，语简而意尽。’

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暴露了他论诗的浅薄和思想的落后，并无损于白居易在这两句诗中所歌颂的卑微者的生命力量，也无损于顾况鉴赏力的高明。

《能改斋漫录》卷八另有一条云：

顾况喜白乐天《送友人原上草》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乃是李太白《瀑布》诗：‘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

对此，我曾经作如下的评述：

“足证吴曾始终无视白诗的思想性，而且一而再的存心要贬低白诗的价值，连只有诗句的格调偶尔相近（文字和内容完全不同）便硬咬定白诗出自李诗。吴曾两次引述白居易的同一首诗，题目一作《咸阳原上草》，一作《送友人原上草》，其实原题是《赋得古原草送别》。至于顾况叹赏白居易这一首诗，许多的诗话、笔记都有记载，现在举唐张固《幽闲鼓吹》中有关的一则如下：

‘白尚书应举，初至京，以诗谒顾著作况。顾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咸阳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即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

这里可见顾况鉴赏力的高明。又从上引两则吴曾的《能改斋漫录》，我们可以这样说：谈论修辞手法，如果完全不顾作品的精神实质，纯粹就作品的字句来下批评，有时是会得到错误的论断的。

吴曾拿白居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来和刘长卿的‘春入烧痕青’相比，以为白诗不若刘诗‘语简而意尽’。既然谈到‘意’，便不应忽视白诗的思想性，更不应该信口雌黄，以为白诗不如刘诗。所以应受‘论诗浅薄’和‘思想落后’的批评。”（拙著《史稿》第六篇第六节）

这是关于《漫录》谈诗忽视诗的思想性的讨论。又从上举两句白诗得到顾况赏识的这一则故事，许多的诗话都有记载这一事实，使我想到另两句白诗也至少有两部诗话提到了不同的看法。《漫叟诗话》曾引《归田录》云：

“晏元献喜评诗，尝曰：‘老觉腰金重，慵便玉枕凉’，未是富贵语。不如‘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乃善言富贵者也。人皆以为知言。”

鲁迅的《革命文学》从其说。其实，《后山诗话》早已指出：“白乐天云：‘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非富贵语，看人富贵者也。”

查“笙歌”、“灯火”二句出自白居易《宴散》一律，诗云：

“小宴追凉散，平桥步月回。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残暑蝉催尽，新秋雁带来。将何迎睡兴，临牀举残杯。”

这是白氏参加盛宴归来之作。“笙歌”二句只是描写宴会中所见富贵人家的景象，如果自己是富贵人家，便不是这样写法了。漫叟断其句而错会其义，鲁迅未暇细检原诗，即从其说，而不知白诗只写看人富贵而已。

我们阅读中国古代诗话，如能比较参照，尤有意义。

本辞典设主编二人，副主编三人，北京、上海、苏州各一人。另特约四十多人参加撰写，他们大都是各大专学府的教授或讲师。

辞典收有一千二百多个条目，共计近九十万字。内容分为三个方面：一、诗话作者。偏重叙述他们的学术成就，而略其仕途经历。二、诗话评析。极力将各家诗话所具有的特色勾勒出来。三、诗话术语。如“神韵说”、“性灵说”、“以禅喻诗”等，并阐述一些字面相近的术语，如“意境”与“意象”意义的不同。

蒋祖怡先生及其合作者试图通过本辞典把中国古代诗话提到诗论的高度，并从中国古代诗话中，突出诗论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发展的情况，列举例证，作具体的说明，希望能收到画龙点睛的效果。我们从蒋先生的学术成就以及和他合作编写的著作人看来，相信是可以做到的。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郑子瑜序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前 言

——试论我国古代诗论的发展及其优良传统

我国古代的诗论源远流长,在上下三千年间,以其独特的民族内容、表现形式以及独特的继承发展传统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今以内容与形式统一的观点,区分为“以诗论诗”(论诗诗)和“以文论诗”(诗话)两大类型,就其发展过程概述于后。

(一)

先述“以诗论诗”这一类型。此类型绝大多数用“七言绝句”,也称为“论诗绝句”。

这种论诗诗滥觞于《诗经·大雅·烝民》中的“吉甫作颂,穆如清风”和《诗经·大雅·崧高》中的“其诗孔硕,其风肆好”。这是我国最早的以诗论诗之句。及至唐代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开创了我国论诗诗之风。在《六绝句》中,前三首论诗人,后三首论诗艺,开创了“论诗”和“论事”相结合的体例。这种论诗诗的主要特征是寓逻辑思维于形象思维之中,亦即两者高度融合,而以形象为主。嗣后,一脉相承,均用七言绝句来论诗或论事,在唐代有刘禹锡、白居易、杜牧、李商隐等,在五代有罗隐、杜荀鹤、韦庄等,在宋代有苏轼、王安石、陆游、杨万里、戴复古等,在金有王若虚、元好问等,在明清有方孝孺、王渔洋、袁枚、赵翼、龚自珍等。

在这发展过程中,有可以注意者一:从唐代杜甫的《六绝句》到金代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不但在数量上为《六绝句》的五倍,而且在组织上更加完备,按照我国诗歌的发展顺序,从汉魏到宋,每一朝诗风都有评论,这是《六绝句》的继承和发展。三十首中的第一首:

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

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

清人查慎行说:“公明自任疏凿手。”所云甚是。按杜甫《六绝句》中

有云：“别裁伪体亲风雅”，元氏《三十首》中则云：“正体无人与细论。”实为元氏揭示其所以作三十首的主要目的。从杜甫《六绝句》到元遗山的《三十首》是一个明显的飞跃，其继承发展之迹甚明。

及至清代王渔洋的《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五首，给论诗诗又创造了新的内容。王氏以所倡导的“神韵说”入论诗诗，其后袁枚又以他倡导的“性灵说”入论诗诗，这又是其间可注意的迹象之二。

宋代是诗的宗派时代，北宋初有“西昆派”，其后又有“江西诗派”，迨及南宋则有“江湖派”。苏轼有诗，深表对西昆派的不满：

五季文章堕劫灰，升平格力未全回。

始知前辈宗徐庾，数首风流似《玉台》。

诗中的“前辈”，即指北宋初倡导“西昆派”的杨亿、刘筠、钱惟演等。并指斥北宋初的西昆派是继承了徐陵《玉台新咏》之风格。

又：王若虚论“江西诗派”似较元遗山之论更为深刻，而且接近客观事实。第一，元遗山贬江西派而尊黄庭坚，诗云：“论诗宁下涪翁拜，不作江西社里人。”第二，元氏又把苏轼与黄庭坚合称“苏黄”。诗云：“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而王若虚却把黄庭坚和江西诗派一起否定，而把苏轼的诗风与诗论和黄庭坚区别开来。其论诗诗曰：“夺胎换骨何多样，都在先生（指苏轼）一笑中。”王氏又把苏轼的诗比做“骏步”，而把江西诗派的祖师们如黄庭坚、陈师道等比作“驽马”，诗云：“骏步（指苏轼）由来不可追，汗流余子（指黄、陈）费奔驰。”这说明了苏轼不仅诗风超越了黄、陈，而论诗的观点也胜于他们。是所可注意者之三。

“论诗诗”到清代还发展为以各人论诗的理论中心作为他们论诗绝句的中心议题，如王渔洋以其“神韵说”入论诗诗，袁枚以其“性灵说”入论诗诗，又如史学家兼诗论家、诗人的赵翼，在他的论诗诗中强调了“今胜于古”的观点，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还有的诗人在论诗诗中抒发了对时局的感慨，如龚自珍的诗（龚氏生活在鸦片战争前夕）：“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表达了对清代统治者的愤懑，对在专制统治下的人民“万马齐喑”的局面表示叹息。又云“我读唐人怨中晚，略工感慨是名家。”肯定了国家危亡时文人诗家的爱国心情（如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杜牧的“欲把一麾江海去，乐

游原上望昭陵”等)。而龚而珍自己也写下了“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样热爱祖国人民的诗句。正如赵翼说的“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此应注意者四。

我国古代论诗诗的作者,在赵宋出现诗话以后,常常兼任诗话的作者。如宋代陆游有《老学庵笔记》及续作,杨万里有《诚斋诗话》,在金代有王若虚《滹南诗话》,清代有王渔洋《香祖笔记》及《带经堂诗话》等。袁枚则有《随园诗话》和《续诗品》等。他们都是一身二任,足见论诗诗和诗话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但是这类论诗诗因为和本辞典中主要内容在叙述体例上很难一致,故不具录。

(二)

次述“以文论诗”这一类型。

如果说“以诗论诗”在我国古代诗论中是涓涓细流的话,那么“以文论诗”这一类可算是波涛汹涌的长江大河了。

“以文论诗”滥觞于《孟子》,在《孟子》之前,《论语》中曾多次记载孔子和他的弟子谈论《诗》。如孔子引“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论语·子罕》),子夏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论语·八佾》)之类,但都是引《诗》来谈论伦理道德问题;《论语》中记载的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和“思无邪”说,对我国古代文论影响很大,但这是总论诗的作用,而不是对具体的诗的评论,和后代诗话还不大相同。《孟子》中就有对具体诗篇的评论了。如在《孟子·告子下》中谈到《小弁》何以怨,《凯风》何以不怨;在《孟子·万章上》中谈到怎样理解《云汉》中的“周余黎民,靡有孑遗”,进而说到说诗者要“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

又《世说新语·文学》记载晋太傅谢安与侄儿谢玄评论《三百篇》事,这些都是片言只语,不能作为后世诗话之先驱。足以当后世诗话先驱的是梁代钟嵘的《诗品》,它是评论五言诗的专著。这种论断,不但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话篇》中说过,而且在明代就早已有人这样说过。明代毛晋在他的《诗话跋》中曾说:“仲伟(钟嵘字)为梁记室参军,一时号为知言,采辑汉魏以来诗家一百二十人,厘为上中下三品,实诗话之伐山也。”到清代乾隆年间,何文焕编纂的《历代诗话》又把钟嵘的《诗

品》放在诸诗话的最前面，把毛晋“诗话之伐山”的见解付诸实践。

我认为，他们之所以如此，实非偶然。因为除了《诗品》全书是论诗专著的原因外，就《诗品》的内容和语言风格两个主要因素而论，它与后代的诗话也是基本上近似的。

以钟嵘《诗品》的内容来考察，正如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话篇》中所说，分为“论辞”和“论事”两大类型。今人论诗话也是分为这两大类，如郭绍虞先生《题宋诗话考·效遗山体得绝句二十首》中第二首：“醉翁曾著《归田录》，迂叟亦题涑水闻。偶出余绪撰《诗话》，论辞论事两难分。”郭氏在诗后又注道：“诗话之体，创自欧氏。故此后诗话多属随笔性质。”

现将钟嵘《诗品》和后代诗话作一比较。

钟嵘《诗品》，《隋书·经籍志》注：“一称诗评。”故评论多于记述。它论诗的比重最大，因之“论辞”亦多。这种例子屡见不鲜。例如，在评颜延之条下云：“汤惠休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采镂金。’颜终身病之。”又评范云诗云：“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评丘迟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这样评诗的方法，在后代诗话里也常被采用。清方世举《兰丛诗话》谓韩愈诗如“出土鼎彝，土花剥蚀，青绿斑斓”，孟郊诗如“海外奇南，枯槁根株，幽香缘结”，卢仝诗如“脱砂灵璧，不加雕琢，秀润天成”，李贺诗如“起网珊瑚，临风欲老，映日澄鲜”。

宋代叶梦得《石林诗话》嘉许这类评论方法的佳妙：“古今论诗者多矣，吾独爱汤惠休称谢灵运为‘初日芙蓉’，沈约称王筠为‘弹丸脱手’，虽是输写便利，动无留碍，然其精圆快速，发之在手，筠亦未能尽也。”

“论事”之例见于钟嵘《诗品》者，如载宝月和尚趁柴廓之死，输窃他的《行路难》而逃，柴子欲诉讼，宝月厚赂之。又如江淹梦郭璞索还五色笔后，才气顿尽等等。后世诗话所记，均有关诗事，为数甚多。如：旧题宋尤袤《全唐诗话》：“乐天（白居易）未冠，以文谒顾况。况睹姓名，熟视曰：‘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及披卷读其《芳草诗》，至‘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又叹：‘我谓斯文遂绝，今复得子矣！前言戏之耳！’”

足见钟嵘《诗品》的基本内容范围和后世的诗话基本相近。诗话中“记事”部分多者，则变为《本事诗》、《唐诗纪事》等书，实亦为诗话的一

支流派，正如章学诚所说：“要其流别滋繁，不可一端尽矣。”这也是事物发展所必然的。

钟嵘《诗品》语言风格的基本特色与后世的诗话也相类似。郭绍虞先生称后世诗话的风格受欧阳修的影响，形成“随笔体”，这是具有卓识的，我认为不如称之为“小品文化”。小品文具有两种特色：一是隽永，常以精练的语言来表达较丰富的意蕴，耐人寻味，发人深思，上例的“芙蓉出水”即是一例。二是随手拈来，信笔写去，行云流水，自然天成，上例中的“弹丸脱手”亦可比拟。这两者在《诗品》和后世的诗话中是水乳交融地混合在一起的，现在为了方便，择其显著者举例说明。先举第一个特色。

《诗品》中评晋代诗人袁宏的《咏史诗》道：“虽文体未遒，而鲜明紧健，去凡俗远矣！”寥寥数语，令人寻思。《世说新语》注引《续晋阳秋》中语云：“虎（袁宏小名）曾为《咏史诗》，是其风情所寄，辞文藻拔。”此评语与《诗品》所评相近。

后世诗话亦多此种风格特色。如清乔亿《剑溪说诗》云：“萧千岩（宋代诗人兼诗论家）谓：‘诗不读书不可为，然以书为诗则不可。’所以沧浪贵妙悟。”这几句话，初读时有些难于理解，读过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就可以了解。严羽的“以禅喻诗”有这样几句话：“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这与萧千岩说的意义差不多。此亦寥寥数语，说出了“诗”与“学问”的关系。

再说他们语言风格方面的第二个特色。

钟嵘《诗品》中论晋代大诗人陶潜的诗风道：“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

前面“文体省净，殆无长语”两句，不但刻画了陶潜诗的特色，而且也显示了《诗品》以及后世诗话语言风格的第一个特色。最后两句，似乎是互问互答，又好像是彼此补充，跌宕生姿，颇堪寻味。后来的诗话中，论陶诗的，在内容中大都不能逾越《诗品》的樊篱，在语言情调上，也都继承保持了这种“小品文化”的风格。如云：“读陶公诗，专取其真，事真

景真，情真理真，不烦绳削而自合。谢鲍则专事绳削，而其佳处，则在以绳削而造于真。”（清方东树《昭昧詹言》）总之《诗品》与后代的诗话用它们的“小品文化”的语言风格来探索、表达诗的含蓄委婉的方法，正有珠联璧合之妙。

但是，从钟嵘《诗品》到欧阳修的《诗话》之间，已有五百年光景。在这期间由于诗的急剧变化，如出现了大量七言诗、律诗和绝句等，特别是由于《诗品》的撰述目的和后代诗话的“资闲谈”大不相同，因此它们之间的“小品文化”的程度也有着显著的差异。钟嵘《诗品》的撰述目的，在其《序文》中讲得很清楚：

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近彭城刘士章，俊赏之士，疾其淆乱，欲为当世诗品，口陈标榜，其文未遂，嵘感而作焉。

可见钟嵘撰述《诗品》的目的，是由于当时的诗论漫无标准，混乱异常，因此，钟氏不得不作有系统的论述。

在《诗品》的《序文》里，钟嵘提出了“滋味”的标准：

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

《序文》在谈到玄言诗时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这是说玄言诗无“滋味”。在钟嵘的同时，许多人都用有无“滋味”作为评论诗文的标准。例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声律》和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中都用过“滋味”，但“滋味”的具体内容却并不完全一致。而钟嵘在上引一段话中对“滋味”作了具体的解释，而且提出“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滋味”的最高层次。

《诗品》还根据这些原则标准，选下了各个时代的人物典型。如“陈思为建安之杰”，“陆机为太康之英”，“谢客为元嘉之雄”，等等。并在对

他们的评论中贯彻这些标准，如评论陈思王曹植道：

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嗟乎！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辉以自烛。

因为陈思王曹植的五言诗是符合作者的最高标准的，所以在《诗品》里被列为上品。

此外，钟嵘还针对当时评论诗篇时的错误倾向，提出“至乎吟咏性情，亦何贵于用事”与“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声律耶”等提倡“白描”与反对“声病”的主张。总之，都是为了树立标准和纠当时之偏。由于这个目的，所以比较有系统。后世的诗话这样有完整系统的不多。

由此可见，钟嵘《诗品》和后世诗话不完全相同。

继钟嵘《诗品》之后，在唐代出现了“论事”的专著——孟棨《本事诗》和“论诗”的专著——皎然《诗式》。这对后来的“论辞论事两难分”的诗话有一定的影响，尤其对话诗中的论诗论事的专著——《对床夜语》和《复斋漫录》等更有直接的影响。（虽则《四库总目提要》中说过“杼山《诗式》在疑似之间”的话，但此书属于论诗性质，是无可置疑的。）

（三）

在北宋初期，我国以文论诗这一类型中，异军突起地出现了一种以“资闲谈”为内容，以随笔或笔记为形式的新品种，当时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就是代表（这诗话是后人从《欧阳文忠公文集》中辑录出来的，《六一诗话》的名称，也是后人所加的）。“诗话”成为这种文体的名称。诗话中也有不以此为名的，如：宋代的《诗人玉屑》、《复斋漫录》等，但绝大多数是以“诗话”称其书的。因此诗话就成为以文论诗中最主要的和最常见的一种。本辞典所述，也以此为基本范围。

《六一诗话》无论在内容形式上都给后世诗话开辟了别具一格的先例。不久又出现了司马光的《续诗话》（此“诗话”专指《六一诗话》），嗣后，宋代诗话就像一批春雨中的鲜花一样纷纷出现，五彩夺目，门类甚多。据郭绍虞先生的《宋诗话考》和罗根泽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第

三卷所载，宋代诗话共约一百五十多种，其中亡佚和后人辑佚的几乎占去一半以上，致使千年文献凋残，至为可惜。

绍虞先生曾把宋诗话区分为“纪事”和“论诗”两大类，但此两类几乎都掺杂在每一部诗话之中。正如郭绍虞先生自己所说的，“论辞论事两难分”。然而诗话的分类，按作者写作的动机而言，似可分为“资闲谈”和“逞广博”两类。前者见于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此书自题称“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而《宋史·艺文志》入“小说类”，（在《汉书·艺文志》中“小说”是“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者所造也”。）反映了我国古代对这种文学形式的轻视。后来许颢的《彦周诗话》，其序云：“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若含讥讽，著过恶，诮纰缪，皆所不取。”这种按照儒家观点给诗话下的定义与要求，意在把习惯为随笔式的“资闲谈”的诗话纳入“温柔敦厚”的轨道，但它的主张对后来的诗话没有什么大的影响。至于“逞广博”一类，多系考证、纪事之作，从刘攽《中山诗话》，发展到吴曾的《复斋漫录》（又名《能改斋漫录》），成为专事考证、纪事的诗话。

又因为宋代诗话很多，后来就出现了专辑集抄录诗话之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宋人喜为诗话，裒集成编者至多，传于今者，阮阅《诗话总龟》、蔡正孙《诗林广记》、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及庆之是编（指《诗人玉屑》）卷帙为富。……仔书作于高宗时，所录北宋人语多；庆之书作于度宗时，所录南宋人语较备。两书相辅，宋人论诗之概亦略具矣。”

宋人的诗话之中，论诗比重最大的是南宋末年范晞文的《对床夜语》。论诗应该是诗话中最主要的部分，因为其中可以见到作者当时的美学观点和文学思想。

欧阳修《六一诗话》中，虽则不废雕琢，但崇尚自然。书中引述梅圣俞之言曰：“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又引严维诗“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与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之句以证。足见欧氏之于诗风，亦倾向于委婉缜密一路（其所引梅圣俞论诗之语“状难写之景”与“含不尽之意”，又开后世诗论中“情”、“境”两者关系的探索之先声。）